

人民日报批评“一些地方领导把城市当作秀场”现象 竹立家:城市建设须摒弃“长官意志”

16日,人民日报刊发“城市的面子与里子”系列报道之4,编发了一组读者来信,并刊发题为《失衡的城市》的“编辑视线”文章。文章指出:失衡的城市折射出的是管理理念与心态的失衡。一些人往往以城市主宰者自居,忽视甚至无视市民的主人翁地位。他们习惯于把城市当作自己的“秀场”,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平台。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竹立家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:城市建设须摒弃“长官意志”。

人民日报刊发的这组来信包括《四川中江县:美丽广场与丑陋公厕》、《山西运城姚暹渠一条河道两番景象:东段风景秀丽 西段污秽不堪》、《上海长宁路一小区为创建文明城区:只管饰外墙不顾伤树木》等。《失衡的城市》一文就此指出,任何设施功能的缺失,都会造成城市机体失衡,从而影响居民的生存及生活质量。今年夏季多发的暴雨,就让我们普遍存在的重地上轻地下之城市病暴露无遗。几年前,年逾古稀

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邹德慈曾坦言:中国的城市建设,基本上是“长官意志”,我接触的地方领导不少,飞扬跋扈的不是个别,这是城市建设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形象要追求,政绩也要有,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为民。有的名义上是为民,实际上是自己。那么,又是什么造成了城市管理者的心态失衡呢?追根寻源,症结在于失衡的政绩评价体系和城市评价体系。图文均据人民日报



运城盐湖姚暹渠东段(左)和西段(右),东段是政府所在地



»对话

搞形象工程不是改革和发展

现代快报:漂亮广场与丑陋公厕,小区马路菜场之热闹与豪华菜场之冷清……这种鲜明的对比最伤民心。为什么会出这些现象?

竹立家:这种现象很普遍,并不是个别现象。为什么会出这种现象呢,关键点有两个,第一个是,这是一个形象工程,不是给老百姓看的,而是给领导看的。因为具体官员的升迁不是由老百姓说了算,这个形象工程搞得让领导满意就行了,至于厕所脏不脏,那领导是看不到的。第二点是,我们有些干部还是没有真正理解民生建设、公共服务的含义。公共服务的目标是什么?就是让人民满意。搞民生建设不是整天把“改革”“发展”挂在口头上,改革和发展也不是整天就是修路、刷墙、建广场。一些干部把改革和发展理解为搞一些形象工程,什么花样比较多,什么比较轰动就做什么,这是进入了误区。还有一些干部,喜欢在网上发发个人信息,喜欢通过微博等和老百姓交流,把这当成改革的内容,我觉得这些都是花样工程,华而不实。现在地方都有政务信息平台,作为官员,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和老百姓交流,没必要搞那些让老百姓搞不清所以然的花架子。改革就是改革,不是哗众取宠。

现代快报:城市的宜居是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之一,那么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宜居的?

竹立家:可以说,“宜居”必然包括这几个方面:一是这个城市公共服务搞得不错,比如说公共教育搞得不错,孩子上学很方便,同时公共医疗卫生等等都搞得比较好;二是安全,大街上看不见警察但是城市的犯罪率很低;三是社会保障搞得不错;四是房价比较合理,老百姓的住房比较到位,老百姓能安居乐业。等等,这些都是城市真正宜居、市民能真正幸福的标志。

现代快报:国家发改委日前对主题公园项目套上“紧箍咒”,新主题公园项目的建设或许批不下来了。对这件事你怎么看?

竹立家:对地方主题公园叫停,这样做是对的。欧洲很多国家,并没有所谓的城市主题公园。你比如说罗马,有着在传统意义上保留下来的公园,我去过罗马市中心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,是市民一处很好的休闲场所,里面的树都是古树,保护得很好,人家没有说搞成主题公园,有的只是自然风光。而反观我们的一些城市,喜欢搞一些所谓的标志性工程,投入了好多资金,结果搞出来的是四不像工程,缺乏自然风光,多是人工的。很多非常好的历史遗存被拆掉了,



竹立家
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,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

却又在上面重新建起假古董,这和罗马对古罗马斗兽场的完善保护形成了强烈反差。在拆建的过程中,一些人得到了利益,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。这不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城市,传承我们的文化,而是本着商业的、市场的眼光,考虑的是把某个地方开发了对城市有好处,事实是越搞越糟、恶性循环。这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着想,而是为了某些官员和开发商的利益着想。这种现象反映出的问题很严重。

现代快报:从根本上来说,城市的管理者绝不能有“城市主宰者”的自我感觉,而应该对这个城市的公共利益持以敬畏之心。

竹立家:这话说得很有位。中国的城市建设必须摒弃“长官意志”。
快报记者 刘方志

»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

深陷“发票门”的慈善总会如何自证清白?

中华慈善总会最近被卷入了信任危机。新近曝光的“尚德捐款门”日前又牵出更多惊人内幕——央视新闻频道8月17日播出的新闻调查称,无锡尚德公司“荣誉”2010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的1700多万元捐赠品,竟被折价变卖,钱款去向不明。而中华慈善总会则被指在额外收5万元现金捐款情况下,为尚德开具了减免税发票。当时去中华慈善总会开发票的当事人罗凡华透露,收钱开发票,是一手收钱一手交票的潜规则。

在信息极度不透明的背景下,真要感谢一下那些内部爆料的人们,没有他们,我们将长期“不明真相”。这回,我们得感谢

罗凡华,这个向央视爆料的深喉,是尚德捐赠的指定执行方——北京中育教育发展公司的前教研室主任,曾担任尚德主办的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组委会主任。

根据罗凡华的爆料,尚德去年捐赠给第四届青少年创意大赛参赛学校的1700多万元捐赠品,只有1%象征性地捐给了少部分学校,其他99%都被捐赠执行方变卖。罗凡华则找中华慈善总会为尚德开出了1700万的减免税发票。今年4月,罗凡华又代表第五届大赛的捐赠执行方北京创新中意公司,找慈善总会开具了1500万元的减免税发票。这两次开发票,慈善总会根本没亲手收货验货,而是在各收到5万元现金的情

况下,就大笔一挥,让企业享受了减免税的待遇。

在尚德捐款门中,慈善总会开出去的已经不是发票,是国家的税收,更是慈善的生命,是人们对慈善朴素的信心。当然,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,慈善总会照例会作出辩解。8月17日,中华慈善总会发表声明,承认收到了罗凡华所说的现金捐款,但根据该会《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,对于捐赠资金,总会按3%左右提取管理费,完全合理合法,不存在所谓的潜规则。不解释倒还罢了,这一解释,我们的疑问就更多了。譬如,区区数十名工作人员的慈善总会,居然要提取3%的管理费?慈善总会这回算不算自爆了猛料?

又譬如,《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只是规定可以从捐赠资金中提取3%的管理费,并没有说在开发票之前要向企业额外收取“捐款”啊。中华慈善总会这个声明前言不搭后语,只能加深人们的疑问。额外捐款是不是开免税发票的附加条件?是不是空头慈善也能从慈善总会拿到免税发票?对于这些焦点问题,中华慈善总会完全避而不谈,如此避重就轻转移视线的声明,只是推卸责任的托词而已。要真正搞清楚发票事件背后的真相,看来监管部门要尽快介入调查才行,让中华慈善总会自己查自己,只能令真相变得遥遥无期。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»热点纵论

加大教育投入不能靠重复收费来实现

财政部日前同意北京市对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,按照其实际缴纳“三税”税额的2%征收地方教育附加。北京市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,实施这一收费政策后,北京市每年将收取30亿至40亿元。据悉,目前全国部分省市已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开征地方教育附加。

(8月17日《新京报》)有人可能不明白:教育附加费不早就在收吗?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——“教育附加”和“地方教育附加”。教育附加自1986年7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征收,收费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,征收对象是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,征收标准是实际缴税额的3%;地方教育附加的

征收依据是去年11月财政部下发的一个通知,征收对象与教育费附加相同,征收标准则是实际缴税额的2%。

无论是征收教育费附加还是地方教育附加,都是为了更好地筹措教育经费,以期到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4%。4%这个目标自1993年提出,千呼万唤,至今没有实现,几乎成了国人的一块心病。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的初衷可以理解,但靠增加收费来实现,就严重跑偏了。

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虽然名称上有所差异,但其实质是一样的,显然属于重复收费,更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负担。众所周知,基于目前的企业经营困境,给企业减税、减费应是主旋律,开征地方教育附加显然是逆势而

为,不仅会加剧企业生存压力,而且收费很可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,进一步推高物价,加重民众生活压力。

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4%这个目标,大体上说有两种途径,一是向民众多收税费,二是在不加重民众负担的前提下,调整财政支出结构,向教育投入倾斜。就财政实力而言,去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万多亿元,今年财政收入预计将超过10万亿元,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长期居高不下。政府手里并不是没有钱,关键是钱怎么花,往哪里投,看看那些巨额三公消费、那些形象工程、那些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……在这些方面节省一点,就足以实现4%这个目标,何需再伸手向民众索取?此外,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的

依据仅仅是财政部的一个通知,其合法性、正当性令人怀疑。“税收法定”原则我们没有做到,往往出台一个行政法规就能征税,这种情况需要改变,同样需要改变的是,中央部门出台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收费,不经代议机关审议,没有听证,没有商量,老百姓只能被动接受。税和费名称和性质虽然不同,但对征收对象的意义相同,无非都是交钱,收税要经过法定程序,收费就不需要吗?4%这个目标并不高,但至今没能实现,个中关键不是因为老百姓交的钱太少,而是相关部门没有把教育当做重点投入领域。民众向政府纳税,政府须提供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,而不能每提供一项公共服务,就要想办法另行增加收费。(浦江潮)

»公民发言

王勇平下课是我们的期待吗

王勇平离开了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,虽然铁道部说这是一次正常的职务调整,但外界普遍猜测,这与他在动车事故后引发的那场引起极大争议的新闻发布会有关。

回过头来看,如果那场发布会的缺憾完全由王勇平本人担责,这对他是一种苛责。当动车事故发生后铁道部面临公信力危机的时候,无论谁来当这个发言人,处境都是一样的。

王勇平在发布会现场的表现,真实地反映了铁道部在危机面前的应对能力,而不是他个人的水平和能力。换个角度看,如果当时发布会的主角不是王勇平,而是一个所谓水平很高的新闻发言人,能把问题回答得滴水不漏,不但不丢分,甚至还能赢得那些许面子,这样“完美”的新闻发布会,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?其实,那些批评王勇平或者为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,如果代替王勇平去开这场发布会,表现也未必能比王勇平更好,就是“好”,也未必就是民众乐于认可的那种“好”。因此,对王勇平和他的那场发布会,不但不应该感到失望,反而应该感到庆幸,庆幸我们当时面对的铁道部发言人,不是一个所谓职业素养极高,能把外交辞令操练到极致的人,这样的人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,会比王勇平更多吗?

铁道部对王勇平岗位的调整没有过多的解释说明,因此,他的工作调整是否和那场发布会有关,谁也不好妄断。应该指出的一点是,在铁道部,王勇平只是一个中级官员,并非掌控大局的人,希望他站在掌控大局的制高点上讲话,事事都给出圆满的答复,这个要求超越了他的“体量”。

对于这场严重的动车事故,公众期待真正有人为此担责。而王勇平只是个新闻发言人,如果舆论的批评成为铁道部调整他岗位的理由,如果这种调整成为回应民意的一个举措,这是我们期待的吗?
(张金陵)